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张永泉 主 编

河北解放区 作家论



花山文艺出版社

0001133501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15
河 北 省 作 家 论

1206.6
0269
作家论

● 张永泉 主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解放区作家论/张永泉主编,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80611-788-1

I. 河…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881 号

河北解放区作家论

张永泉 主编

责任编辑:刘桂欣

装帧设计:杨怀武

美术编辑:杨怀武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石家庄市西焦印刷厂(友谊北大街 75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7.5 印张 50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1.00 元

ISBN7-80611-788-1/I·708

前言

《河北解放区作家论》是一部由 33 篇作家论组成的论著，既是一本论文结集，又是一部主题集中、观点明确、自成体系的专著。本书所论作家包括如下三种类型：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现今河北省属地的各解放区工作有一定创作成就的作家。二、解放后仍在河北工作有一定创作成就的作家。三、解放后虽然离开河北但仍以当年的斗争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且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可以说，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全面而深入地论述河北解放区文学创作成就的著作。

本书所论对象为河北解放区作家，但所论述的具体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们解放区时期的创作，而包括他们一生或迄今为止的创作的全部作品（个别跨度太大的作家如丁玲除外），每篇论文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家论。所以如此立意，乃出于如下考虑：当代文学特别是“文革”前 17 年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一脉相承，它是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和发展，这在解放区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充分展示解放区文学的辉煌成就，无疑应把这些作家解放后的创作收入视野之内。以魏巍为例，他不仅在 40 年代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的光辉诗篇，在 50 年代又创作了连续产生轰动效应的反映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报告文学，新

时期以来又出版了具有一定历史深度广受欢迎的长篇小说。将他三个时期的创作放在一起进行宏观考察,则深刻揭示了解放区文学深远的历史意义。“巍巍论”就是这样一篇完整的作家论。

在具体论述每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时,本书坚持以下两条标准:一、作品标准,即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二、文学史标准,即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本书所论作家大多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他们的创作大多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席之地,如丁玲、孙犁、巍巍、梁斌、郭小川、徐光耀等等。但也有一些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创作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正是他们同上述作家的作品一起,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使文艺真正完成了从整体上走进时代,走进人民大众的历史性转变。

解放区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有着无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但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有其特定的阶段性,因而,历史的必然性中往往同时也就蕴含着历史的局限性,解放区文学也是如此。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例,这是解放区文学所遵循的最高原则,是解放区文学最基本的特质。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高主题的形势下,把文艺视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有着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也正是解放区文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当革命已取得完全胜利,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形势和任务都已发生根本变化后,仍然不断升温地强调这一原则,并且把政治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其历史局限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这是本书对以往的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一个深化,这对全面认识解放区文学的成就与局限,给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都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本书作者均为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可以说,这是我省现当代文学研究实力的一次展示,也是这本书在整体上能达到一定学术水平的保证。但也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各个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个别篇章甚至还留有较多的遗憾,这是有愧于有可能读到这本书的读者的。

目 录

丁玲论	张永泉
田间论	苏庆昌
孙犁论	赵建国
梁斌论	郝 雨
魏巍论	蔡子谔
王林论	王惠云
陈辉论	方 伟
康濯论	纪桂平
阮章竞论	苗雨时
杨朔论	王维国
秦兆阳论	封秋昌
邵子南论	黄彩文
钱丹辉论	周进祥
袁静论	范川风
傅铎论	周进祥

目录

郭小川论	陈 超
胡可论	周进祥
曼晴论	苗雨时
张志民论	张俊才
邢野论	郑连保
杨沫论	李 杨
杜烽论	张同俭
徐光耀论	杨振喜
雪克论	崔志远
路一论	李怀亮
远千里论	王 洁
萧也牧论	赵 军
刘艺亭论	杨振喜
冯志论	王维国
刘流论	郑欣欣
管桦论	赵 朕
柳杞论	刘荣林
杨润身论	史锦秀

丁玲论

●张永泉

〔作家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在中学读书时即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到上海入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学习。1927年底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入党,曾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遭国民党特务绑架,1936年赴陕北苏区。抗战胜利后到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市,1946年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团,到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运动,后创作出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后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1955年开始受到不公正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作品有十卷本《丁玲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是从丁玲到达陕北后开始的。此前的苏区文学虽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论从创作队伍还是作品的文体样式、作品的结构模式以及作品的艺术水准看,都还构不成完整的艺术形态,它

还只是解放区文学的源头和雏形。丁玲到达陕北后,革命政权内部才有了正式的文艺团体,有了专业的创作队伍,最重要的是,有了显示出强大实力的文学创作。丁玲是解放区文学当之无愧的开拓者。然而,丁玲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放区作家,五四运动的洗礼,鲁迅重要的影响,多年的创作积累,使她对解放区文学的历史使命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她自觉地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使命融为一体,注入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她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已作为20世纪文学经典被选入各种范本,她的对中国步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最深刻反映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一座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解放区文学因为有了丁玲的名字而显示出一种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一脉相承的风采。

1936年11月,丁玲逃离国民党特务的魔掌到达陕北苏区,当时正是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的要求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丁玲以作家和战士的姿态热情投入了促进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斗争。她到陕北不久,就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选为文协主任。她在为文协会刊《红色中华·副刊》写的代发刊词《刊尾随笔》中明确表示了文艺“是战斗的武器”的思想主张,并号召文艺工作者及广大革命战士拿起笔,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而斗争。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她以一名红军战士的身份随部队到了前线,

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戎马生涯，后来又亲自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直接与红军战士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她通过直接观察和切身感受，写下了十几篇反映红军指战员战斗生活风貌的通讯、散文和速写。这些文章虽然大都写得比较简单平直，有的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真实地写出红军以至苏区生活的一面，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红军和苏区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最值得提起的还是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篇小说写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特别是丁玲并没有把作品简单地作为一种思想的宣泄，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并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积累，使作品充满了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国民党广大官兵，它是一副清凉剂，使他们从对工农红军的盲目仇视中清醒过来，又是一副催化剂，催促他们从思想感情上真正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这是文艺战士射向日本侵略者的一颗枪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丁玲以更为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战斗。适应斗争的需要，她发起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她身着戎装，率领服务团的干部战士奔赴抗日前线。但作为一名作家，丁玲并没有满足于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一时期，在写下大量与服务团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散文的同时，她还写了不少杂文、剧本和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短篇小说《新的信念》。作品塑造了一个被日本侵略军奸污后在痛苦与仇恨中愤然觉醒的老年妇女的形象。她不顾自己内心的羞辱，不顾家人的一致反对，反复向人们宣说那些残酷的事实，以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鼓动大家“都上队伍去”，和侵略者“干到底”。作品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描写向人们宣告，

一种新的信念，誓死不做亡国奴，坚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正在被践踏被凌辱的中国人民心中升起。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党员作家，丁玲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她自觉地把自已的创作置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下，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去奋斗。考察解放区前期的创作，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丁玲这样表现出这么高的政治热情，把自己的创作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贴得这么紧，也还没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像丁玲的作品这样，在民族救亡的斗争中焕发出这么大的鼓舞作用和战斗力量。丁玲，不愧为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但丁玲对解放区文学的贡献不止于此，她的开拓与奠基作用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思想启蒙方面。历史发展到20世纪，对世界各民族的要求是彻底结束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尽快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扰，中国人民不得不把很大精力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斗争上。但从根本上说，救亡图存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而这并不能也不应该等到救亡图存的任务完全完成之后才去着手进行，特别是思想准备即民族启蒙方面的工作更是如此。另外，即使从完成救亡任务的角度来看，对启蒙也不容有一点点忽视。因为对于有着沉重的封建文化心理积淀的中华民族来说，如果不使整个民族特别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革命的主力军首先取得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自觉批判意识，就不可能使全民族获得真正现代意义的觉醒，也就不可能使救亡斗争完全沿着健康的轨道胜利前进。作为一名亲自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作家，丁玲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实际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在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与革命斗争不适应的消极腐败落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严重地腐蚀着革命的肌体，如果

不把它们清除,革命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基于这样的认识,丁玲以她特有的坦率,以她特有的艺术良心和勇气创作了在当时被某些人指责为不合时空后来又几经磨难但却被历史证明对革命事业有着重要意义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三八节”有感》为代表的一系列杂文。

将描写同一题材的小说《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一番比较,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的这一认识。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劳动妇女带来的不幸,从中国传统道德看来比夺取她们的生命还要惨痛的不幸。但两者所表现的思想重点却截然不同。《信念》写陈老太婆被辱后在悲痛中奋起,用自己的不幸去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鼓动人们起来进行斗争。不能否认这些描写的积极意义,但严格说来,这里有不少作家的理想成分。这使得这篇小说因理念太强而未能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相比之下,还是《霞村》写得更为成功,更为感人。一个年仅16岁的山村女孩子,不幸被日本侵略军掳去做了随营军妓,她不甘忍受这种屈辱,偷偷跑了回来,但又自动接受抗日政权的派遣回去做情报工作。她的遭遇令人同情,她的牺牲精神更令人钦敬,然而当她带着一身病回到村里,受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冷眼与非议,以致使她无法在村里生存下去。作品通过真实可信的描写让人看到,古老的封建鬼魂是多么顽固地缠附在中国人身上,这与残酷的民族斗争的现实是多么不相适应,因而帮助他们甩掉这古老的鬼魂是多么重要。《霞村》确实不如《信念》基调高昂,但它却蕴含着更为深沉的感染力,能激起读者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并进而铲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思想观念的信心与力量。

《在医院中》则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同一现实。作品的主人公陈萍是在艰苦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开始走向成熟的革命知识分子

的典型。她有着多侧面的性格,但鲜明的现代意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则是其性格的核心。还在投身革命之前,作为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她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民族的屈辱,人民的灾难,使她不顾自己所学的专业,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她离开上海,来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党的教育,革命理论的洗礼,使她的这种使命感得到新的升华,她的思想跃到一个新的境界,“为了广大的人类”,彻底改造旧制度,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的境界。尽管她在接受工作分配时曾强调个人的志愿,但她还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新生活”。到了医院,她即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了工作。她不仅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只要是与革命事业及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她都主动过问,积极参与。为此,她不怕得罪人,包括医院的领导。看护人员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又毫无服务精神,她就严格要求她们。她时刻把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常常为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改善与很多人发生冲突”。为了改善医院工作,她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乃至和小生产观念及官僚主义严重的院长产生尖锐冲突,因而受到无情的讽刺和打击。就其实质来说,这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现代意识与传统守旧观念的斗争,虽然陈萍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最终败下阵来,但她并没有消沉下去,在经过一番思想波折之后,终于认识到革命的艰难和曲折,并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不足,“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医院,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以说,丁玲是以自己对现实的深切感受为基础,以自己的人生哲学为指导塑造出陈萍的形象的。这一形象的出现,不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它不仅把解放区文学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给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

了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而且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在当时大批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和作用，是个急需解决的课题。尽管由于家庭出身和学校教育，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与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弱点，但他们那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身上肩负着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使命，肩负着对中华民族进行思想启蒙，将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农业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向着思想现代化目标艰难迈进的历史使命。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使之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并充分保护和调动他们的革命热情，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将会极大地提高革命队伍的思想素质，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使中国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胜利前进。

丁玲是在五四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科学民主思想在她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她的思想是现代的，与封建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这在她的创作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写于1938年的记人散文《杨伍城》，在写出农民出身的战士杨伍城憨厚朴实，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优良品质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与这种品质同时而来的致命弱点——缺乏自我意识的奴性。在首长面前，他总是像奴仆对待主人那样表现出一种贾桂精神。丁玲直言不讳地写道：“他虽说对我好，我却不满意他那种近于奴隶性的忠实。无论我怎样同他亲近，教他认字，同他谈天，启发他，希望他对我用平等的同志的态度，而不把我看成是主人，他都还是那个样。”这个批评确实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完全符合杨伍城这样的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的思想实际。长期以来，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束缚了农民的头

脑,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抱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这使得他们往往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领导,而他们一旦掌了权,又反过来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这严重影响着革命队伍思想素质的提高。不仅如此,这种封建等级观念在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时,延安兴起一种“干部衣服”,它是人们等级的标志。为此,有的人宁肯借钱欠债,也要做一身这样的衣服。透过这种现象,丁玲看到传统观念对革命队伍的侵蚀,写杂文予以针砭,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现代观念。丁玲创作中的现代意识,更主要的还是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彻底解放的执着追求。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还是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霞村》的核心是人,人的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轻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作人看待。现代意识的核心则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命运的关心,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小说中的人物对贞贞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极为鲜明地表现了这两种思想观念的根本对立。今天,当《霞村》的思想内涵再一次为人们所了解,所认识,对于丁玲在贞贞身上寄予的深切同情与关注,人们也许不再觉得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只要 we 沉下心来深入地想一想,几千年来封建贞节观念是多么无孔不入地渗入每个人的头脑,而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又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就不难发现,丁玲的这种抗天拒俗的思想是多么宝贵。或者再进一步,客观地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如果没有丁玲这篇小说,我们自己突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贞贞这样的人物,对她将抱怎样的态度?我们会不会只是对她抱有一种遗憾、惋惜以至怜悯的感情?我们能不能像作品中的“我”实际上是作者丁玲那种充分看到并肯定她那种不为痛苦压倒而一心向往光明的倔强精神?能不能像丁玲那样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和她交

朋友,即使是在被村民视为异类的情况下也毫不惧悔?能不能像丁玲那样给她安排一个新的前程,让她和我们一道走入革命的行列?这时,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还存在着封建思想观念的残余。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惊叹丁玲高度的现代意识,那种与封建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并为追求人的合理生活而向它发出猛烈扫荡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不仅表现在对贞贞的态度上,也表现在“我”也就是丁玲的整个待人处事的原则中。中国人总是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干预他人的秘密,有时这种干预还以关怀的形式出现。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但丁玲却不是这样。本来,在一片冷眼与蔑弃中,“我”是贞贞惟一可信赖的朋友,但特殊的遭遇所造就的极为敏感的自卫心理,使她不愿向“我”完全展开自己的心扉。对此,“我”没有丝毫不满的心理,表示“将永远不去触及她这秘密”,而且不许那些喜欢传播议论这秘密的姑娘小媳妇前来向“我”报告些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指属于私人感情的事,既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这感人的大度与宽容,这对人的高度理解与尊重,正是现代意识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的具体表现。

就是这样,丁玲以一个革命战士的热情和革命作家的现代觉悟,将解放区文学所应承担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与双重历史使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尽管这仅仅是开始,她还没有在作品中充分描写出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还没有充分描写出中华民族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抛弃旧我从而所获得的现代意义的觉醒,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但却给解放区文学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使解放区文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如历史所昭示的,后来在整风特别是审干中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种种失误,因而在不同程度削